

WTO《SPS 协定》框架下日本参与中欧货物贸易争端情势研究

任鸿远（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在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下，日本提出加入欧盟诉中国货物贸易措施案并得到 WTO 的支持，增加了中国的应对难度和挑战。本文通过梳理涉诉中国措施，分析日本的加入理由，提出了相关的应对建议，为有效应诉该贸易争端提供参考。

关键词：货物贸易；SPS 协定；贸易争端

中图分类号：D9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167（2025）032-0028-03

Research on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U-SINO Goods Trade Disput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WTO SPS Agreement

Ren Hongy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WTO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Japan's proposal to join the EU and sue China for measures on goods trade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WTO, increasing China's difficulty and challenges in respond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Japan's reasons for joining the trade dispute by sorting out the measures related to China's litigation,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response suggestion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effe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trade dispute.

Keywords: goods trade; SPS agreement; trade disputes

2022 年 2 月 10 日，日本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向 WTO 提出将其增加为诉讼方的请求，同欧盟一起要求中国调整针对欧盟特定成员的相关货物贸易措施，避免在 WTO 框架下造成贸易壁垒风险。目前，该诉讼尚未终结。2025 年年初由于欧盟提出暂停的请求，WTO 专家组已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暂停了相关工作。在 WTO 框架下，第三方成员参与两个成员间的贸易纠纷是被允许的，并且是普遍现象，但是会对被诉方造成较大的压力，并影响应诉准备以及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在诉讼暂停期间，针对日本方面的参与以及相关诉求，有必要进行研究，进而提出相关应对策略，为中国在应诉时积极应对，化被动为主动提供参考。

1 诉讼涉及的中国相关措施

根据欧盟、日本向 WTO 提出的诉求，主要涉及三类中国措施，一是欧盟对争议产品相关的中国进口禁令或进口限制措施，二是中国对欧盟发布实施的出口禁令或出口限制措施，三是中国发布实施的限制或禁止欧盟或欧盟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或对欧盟消费者提供中国服务供应商提供服务的相关措施。

通过诉讼文件可以发现，欧盟、日本方面提出其所关注的相关措施制定主体包括两类。他们认为中国实施和管理的这些措施或是由国家层面制定实施，或

是相关部门单独制定实施。此外，欧盟、日本方面也认为，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从欧盟特定成员进出口货物或向欧盟特定成员提供服务发挥壁垒作用。另外，他们认为这些措施也打上了欧盟特定成员标签，只要涉及来自或运往欧盟特定成员或以各种方式与欧盟特定成员有关联的货物或服务，都受到这些措施对影响，并为危及整个欧盟供应链安全。欧盟、日本方面也认为其所关注的中国相关措施相互关联，对欧盟以及过境欧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实施有针对性的禁止或限制，并且会对整个欧盟及其全球其他关联性市场造成不良影响。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是中国故意为之的，中国通过政府的行动和 / 或通过中国境内实体（包括地方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设计、颁布或实施的措施，在政府的授权下或与政府合作，鼓励、激励或以其他方式煽动旨在限制与欧盟，特别与欧盟特定成员的贸易。

此外，诉讼文件中还提及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国海关总署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未能采取清关所需的政策保障，进而禁止或限制从欧盟特别是欧盟特定成员进口的货物、服务。另外，中国还对与欧盟特定成员有关联的产品的过境给予不优惠待遇。中国国有贸易企业在涉及与欧盟特定成员有联关联的欧盟进出口的采购或销售，也没有遵守 WTO 非歧视待遇原则。特别是中国实施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故意或无理地歧视欧盟和其他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成员国,包括在中国本国领土和欧盟领土之间,并在涉及与欧盟特定成员有关联的货物时进行限制。对于欧盟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境内向欧盟提供服务,以及对于向中国服务供应商寻求服务的欧盟服务消费者,如果这些服务、供应商或消费者与欧盟特定成员有关联,中国则采取了与欧盟其他成员的服务供应商或国内服务供应商不同的非对等原则,予以限制。

2 日本基于 WTO《SPS 协定》的诉讼理由

日本在诉讼文件中提出,中国是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据日本财政部统计,2021 年,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总额约为 3500 亿美元,占日本贸易总额的近四分之一。中国也是日本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日本认为,欧盟磋商请求中确定的争议措施种类繁多,包括有关清关管理措施、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国有企业行为以及影响与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其他措施。特别是,中国的有关措施违反了 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协定》(《SPS 协定》)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原则。此外,有争议的措施可能会对日益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产生影响。考虑到欧盟是日本在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主要合作伙伴,日本显然是此案的利益相关者之一。

《SPS 协定》主要是规范 WTO 成员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健康而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行为,从而保障 WTO 成员间的贸易不遭遇贸易壁垒。日本方面指出中国相关措施违反了《SPS 协定》的第 2 条、第 8 条以及附件 C 第 1(a)款的相关规定,会对欧盟方面造成技术性贸易壁垒风险,进而影响日本与欧盟的正常贸易。

针对欧盟方面的诉求,《SPS 协定》第 2 条规定的是 WTO 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根据该条规定,WTO 成员在不违反该协定的前提下,可以基于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考虑,制定相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但是,制定这些措施时,WTO 成员要确保在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内实施,如无充分的科学证据则需要废止,但第 5 条第 7 款规定的情况除外。另外,制定措施对成员不能对于情形相同或相似的成员实施差别待遇,造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这些措施也不能变相限制国际贸易。依据该条款,日本认为中国没有确保其适用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不会在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成员之间,包括在其本国领土和欧盟领土之间,造成任意或无理地进行歧视,并且变相限制了国际贸易。

《SPS 协定》第 8 条规定的是 WTO 成员实施的控制、检查和批准程序。根据该条规定,WTO 成员在实

施控制、检查和批准程序时,包括关于批准食品、饮料或饲料中使用添加剂或确定污染物允许量的国家制度,应遵守该协定附件 C 的规定,并在其他方面保证其程序不能违反《SPS 协定》的相关规定。日本认为中国在控制、检验和批准程序的运作中,没有保证这些程序与本协定的规定一致,因此认为中国的相关措施违反了该条规定。

《SPS 协定》附件 C 是关于控制、检查和批准程序等相关规定,其第 1 条(a)要求 WTO 成员对于检查和保证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任何程序,不应受到非正当理由的迟延,并且对进口产品实施的方式不能严于国内同类产品。日本依据该协定附件 C 第 1(a)款的规定,指出中国在检查和确保卫生措施履行的程序方面存在问题,并且对进口产品实施了非对等于国内同类产品的优惠。

3 影响分析

3.1 影响中国的应诉准备

针对日本的诉讼理由,中国需要从日本是否是此案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中国相关措施是否违反了《SPS 协定》的第 2 条、第 8 条以及附件 C 第 1(a)款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的相关措施是否会影响日本与欧盟的正常贸易等方面做应诉准备。不仅需要中国相关部门大量收集日本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数据,而且需要搜集基于中国措施而导致日本所谓的贸易遭受影响的最直接的佐证材料^[1]。但是由于该案件为国际诉讼,相关数据搜集难度会比较大,周期会比较长,并且在搜集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外方的阻挠,因此需要相关人员做好周密的筹划与应对策略。

3.2 影响中国在 WTO 的形象

贸易纠纷问题有很多种解决途径,如双方相关部门直接进行沟通、在双方相关代表团互访期间列入互访议题以及在 WTO 会议期间进行双边磋商等。而只有在穷尽前期各种形式的交流而达不到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将纠纷解决途径升级到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期望借助 WTO 的公信力,作出让双方都信服的裁决^[2]。在这种情况下,有第三方成员作为“原告”加入到案件中来,对“被告”而言,不仅会造成诉讼压力的增加,更会在 WTO 成员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是另一种形式的“抹黑”行为,因此日本的参与势必在 WTO 给中国造成不好的影响。

3.3 影响中国相关措施的实施

根据 WTO《SPS 协定》的相关规定,WTO 成员是可以制定技术法规、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的等相关贸易规则的。但是前提是这些贸易规则不能跟现行的国际标准的相关要求相违背,不能给国际贸易造

成技术壁垒^[3]。中国是严格遵守 WTO《SPS 协定》相关规定,在制定相关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切实履行了通报义务。因此,如果相关成员认为中国通报的贸易措施存在技术壁垒风险,应当在评议期提出评议意见,进而推动相关问题在贸易规则正式发布实施前得到解决。如果上升到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就势必会影响中国相关措施的正常实施。

4 中国的应对建议

运用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推动相关贸易纠纷问题有效解决是 WTO 成员惯用做法^[4]。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贸易纠纷案件呈增多趋势。但是,WTO 成员诉讼中国的贸易纠纷案件为数不多。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较好地遵守并履行了 WTO 成员义务,另一方面也证明中国与 WTO 其他成员之间融洽的双多边贸易关系。针对日本加入欧盟诉讼中国货物贸易措施的情况,中国应当积极面对,一方面推动相关贸易纠纷的解决,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推动 WTO 其他认识、了解中国的货物贸易措施。

4.1 遵照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应诉

首先,商务部门要牵头组建由来自市场监管、海关、工信等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熟悉 WTO 规则、国际贸易的专业律师、学者、企业代表等为核心的应诉工作团队,研究诉讼材料,做好应诉准备,参与诉讼。其次,系统研究、分析 WTO《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SPS 协定》相关条款,在弄懂弄通的基础上,找到对中国有利并能够支撑中国应诉的规定,并与中国的应诉材料有效结合,才能够在参与诉讼的过程中有效地运用这些规则为中国应诉提供有力支撑^[5]。再次,要专题研究日本的诉讼理由,特别是基于日本与欧盟及其特定成员间的双边贸易情况,分析日本方面参与该诉讼的原因与目标,并考虑中国与日本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制定相关应诉策略,确保从合理、合规等方面找到应对突破点。

4.2 适时推动中国规则制定工作对外开放

首先,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特别是贸易措施制定部门,对 WTO《SPS 协定》等相关国际规则的了解和运用的能力和水平,这样一方面能够在相关措施制定的过程中具备国际视角,领域方面能够确保相关措施与国际规则相接轨。其次,要切实履行 WTO 成员通报义务。严格按照 WTO《SPS 协定》等相关要求,及时的在措施制定的适当阶段将中国制定的可能会影响国际贸易的措施通报给其他成员,并及时地答复其他成员的评议意见。再次,制定切实可行的途径,拓宽国外利益相关方参与到相关措施的制定工作中,帮

助其更好地了解相关措施制定的前因后果,也有助于制定机构倾听国际的声音,在提升中国相关措施国际透明度的同时,将潜在的贸易纠纷化解于萌芽阶段。

4.3 不断推动中国规则“走出去”

首先,在政策、技术等方面,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参与日本、欧盟等相关机构组织制定的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等规则,促进国外这些措施能够倾听中国企业的声音,增进中国相关规则与这些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等规则的对接。其次,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组织框架下,共同提出标准、规则提案,在彼此感兴趣的领域内联合制定相关规则、标准,并推动这些规则、标准在具体的国际贸易中应用实施^[6]。再次,借助中国-欧盟标准化工作小组、东北亚标准化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加强标准、检验检测规则宣传,推动各方关切的标准、检验检测规则等互认,增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交流,推动检验检测结果的互认。

4.4 适当采取对等措施予以回击

首先,可以聚焦新能源汽车、农食产品、纺织品、锂电池等领域,选取日本、欧盟出台实施的会限制中国出口贸易相关措施,针对其给中国国内企业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其他不良影响,运用 WTO《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SPS 协定》等相关规定在 WTO 发起诉讼。其次,系统梳理中国与日本、欧盟双多边贸易的贸易情况,针对各方较为关注的重点贸易产品,通过加大进口检验、检测、检疫频次,延长检验、检测、检疫周期等,实现对等制裁的目的。再次,制定或修改中国国内相关贸易措施,特别是从难度、复杂度等方面提高相关技术要求,调整官方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清单,加大过双多边贸易的监管力度。

参考文献:

- [1] 胡建国,陈禹锦.论 WTO 的危机及其化解——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视角[J].司法改革论评,2022(02):260-278.
- [2] 杨琳.WTO 上诉机构僵局的解决路径评析[J].现代商贸工业,2023(12):46-49.
- [3] 刘彬.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论争的常态与非常态[J].国际经济法学刊,2021(03):59-70.
- [4] 王振谦.论 WTO 上诉仲裁的常态化运行[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5(02):110-125.
- [5] 李光远.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与国际法的重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4(18):33-35.
- [6] 汪斌等,中国标准“走出去”的主要特征与优化路径[J].科技导报,2023(17):104-110.